



从延安到闽南

福建省华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——平浪

平浪，1918—1991年，四川省大竹县人。早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。1938年1月赴延安参加革命，3月进延安抗大学习，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0年任太行区青委会各救总会千训班政治指导员、党支部书记，沙河县救联会主席、合作社社长等职。1949年随军南下，入闽后，历任龙溪专署文教科长，华安县委书记兼县长，漳州农校校

长兼漳州市中学党支部书记，福建省委党校党委委员、高干自修班副主任、哲学教研室主任。1963年后，历任厦门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，龙溪地委党校校长兼书记，地直机关党委书记，地区科委主任，地委常委兼专署顾问。1983年10月离休。1991年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。1991年10月28日在漳州逝世。



凤女士。黄老今年已经80岁高龄，但精神矍铄，思维敏捷。从她的介绍中，我们了解到平浪离休后依然精彩的故事，也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。

黄金凤介绍说，1989年，71岁的平浪离休后，还是闲不下来，担任了漳州市关心下一代协会主席，关协的工作成了平浪生命的组成部分。有人做过统计，到他住院前，已经抱病到各县、乡镇作了上百场的革命传统教育报告，直到实在撑不住为止。

黄老深情地回忆说，平浪是闲不住的人。1990年9月，他因患胸腔甲状腺肿瘤等多种严重疾病住院治疗，住院后仍念念不忘关协的工作，牵挂着青少年。等到病情好转了一些，他又抓紧时间动手整理第二部分的回忆录。1990年初，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分回忆录《从延安到闽南》。他希望能给青少年再留下一些革命传统的教材，所以抓紧写第二部分的回忆录。他每天都在病房里边吸氧气边改稿，一丝不苟，相当用心。

最后的声音：中国共产党万岁！

病重期间，平浪多次向组织和家属子女表达过要将遗体献给医院搞科研的心愿。1991年10月25日，平浪叫人拿来笔和纸，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：“我的甲状腺瘤已50年，好几个医生都说是个奇迹，很有科研价值，我是共产党员，要全心为人民服务，我死了把遗体献给市医院科研。平浪1991年10月25日。”他的爱人黄金凤在遗书上签下了自己同意的意见。平浪，成为漳州市第一个自愿捐献遗体的干部。

26日，平浪转到了重病室，心、肺、肾开始全面衰竭。下午，漳州市五套班子领导来看望他，平浪说：“感谢医院全力治疗我的病。”他又郑重地交代要从简办理后事。晚上，市委组织部领导来看望，他紧紧拉住领导同志的手，眷恋地说：“我就要离开你们了。”他歇了一口气，发出最后的声音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一个共产党员从心里迸发出来的心声，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，热泪盈眶。

（摘自2011年6月27日《中国县域经济报》，作者为黄长秋、朱亚圣）



1938年，一位青年只身从四川千里跋涉奔赴延安参加革命。1991年，这位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离休老干部，在病危时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说：“我记得19岁入党时的宣誓，我没有食言。”他，离休后还热心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，成为全国先进个人，逝世后又留下遗嘱，成为福建省漳州市第一个自愿捐献遗体的干部。他，就是福建省华安县第一位共产党组织领导人、首任县委书记、原中共龙溪地委常委、龙溪行署顾问平浪同志。

为了了解平浪的生平事迹，追寻他的光辉历程，记者近日从福建省会城市福州驱车4个多小时，赶到了闽南金三角之一的漳州市。

三千里投奔延安

记者找到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一石。知道我们的来意，曾一石十分热心，马上交代档案科人员找出1999年3月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《历史足迹》以及随后出版的《中共闽南地方史》等书籍资料，供我们参考。

曾一石说：“你们要了解平浪有关情况，我介绍一个人跟你们对接，我们研究室的科长陈坤山，他10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平浪的稿件，对平浪的事迹比较了解。”

陈坤山告诉记者，平浪是四川省大竹县人，1937年在重庆川东联立师范学校就学时，由于参加抗日救国活动，偷偷阅读《社会主义入门》《大众哲学》等进步书籍，初步接受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，在老师的指点下，于1938年年初，背着沉重的行囊，跋山涉水，历时近百天，行程3000里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。

在陕北，平浪先在冯文彬、胡乔木同志主办的安吴青训班学习，后经引荐，得到刘少奇同志的书面介绍，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，编入胡耀邦同志任政治委员的一大队学习。1938年5月还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。由于勤奋学习，埋头苦

干，他于1938年6月16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毕业后留校任区队长等职，在抗大工作了3年多。

全国胜利在即，需要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，到新解放区工作。当时，平浪在河南辉县联社任社长，他坚决响应随军南下的号召，积极报名，得到批准。经过短期的集训和编组，1949年4月底，这批对外称为解放军长江支队的南下干部，跟随解放大军向南挺进，6月上旬进入了福建境地。

剿匪华安

平浪在解放华安、肃清匪患、完成土地改革任务、建立和巩固华安人民政权等方面，艰辛地工作了两年多。

陈坤山说，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。25日，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召开会师大会，会上宣布成立了中共龙溪地委会、龙溪专员公署、龙溪军分区和漳州地区军管会，平浪被任命为专署文教科长。10月初，地委书记李伟找平浪谈话，宣布地委的决定，任命他为中共华安县工委书记兼华安县人民政府县长，并且告诉他，华安国民党当局已派人到军管会请求和平接管，组织上已经确定实行和平解放，但也做武装解放的准备。

之后，平浪与地委组织研究了华安干部配备，同军分区研究了兵力部署，紧接着进行了干部训练工作。在接管过程中，由于以黄雨定为为首的“华安民众自卫总队”反动地方武装拒绝缴械，上山为匪，于是，在平浪等县工委领导下，全县军民展开了一场保卫和巩固华安人民政权的剿匪斗争。在新圩战斗中，平浪带领10多名县大队队员，机智地击退黄雨定纠集的5股二三百名匪徒的包围，他的棉衣被打穿一个洞，胸前的钢笔也被打断，幸未负伤。新圩一战，福建省政府的《政报》和《漳州日报》载文详细介绍，平浪受到省政府主席张鼎丞和龙溪地委通报表扬和嘉奖。

1949年12月至1951年6月，全县击毙和处决匪首、惯匪、地霸394名，处予管制和监督劳动467名，劳改110名，判刑9名，荡涤了华安历史上遗留的污泥浊水，从此洗刷了“匪区”的印记。

1951年6月，中共华安县县委庄严宣布全县剿匪胜利结束，并且接着开展土地改革运动。县委决定成立县土改委员会，平浪担任主任。由于匪患彻底肃清，社会空前安定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由衷地感激和敬佩，时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因此，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，进展顺利，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，为之后在全县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上百场报告激励后人

当天下午4点，在漳州市委党史办的帮忙下，记者联络到在漳州电视台工作的平浪的儿子平龙。平龙回忆说，父亲对下一代倾注了无限的爱，经常到各县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，但他在对待自己子女方面，却是严格要求。父亲在华安工作期间，他们还小，有一天晚上，自己和姐姐很想看电影，由于没票，眼看着很多人进场了，平龙急得哇哇大哭，查票的人就好奇地问，你为什么哭呀？你的爸爸是谁啊？平龙说我爸叫平浪。哦，是书记的小孩儿，进去吧。看完电影的姐弟俩高兴地回到了家，并把事情经过告诉父亲，没想到，姐弟俩被平时眼里看起来慈祥的父亲狠狠批评了一顿。

在平龙的带领下，记者一行拜访了平龙的母亲、平浪的妻子黄金

在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洛阳矿山机器厂（简称“洛矿”）内，焦裕禄大道西侧的人行道上，陈列着一台63年前由焦裕禄主持制造的全国第一台直径2.5米双筒卷扬机。日升月落，寒来暑往，它静静地屹立在那里，向人们诉说着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。

初到洛矿

1953年，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。当时，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，有6个在洛阳立项开工，其中就包括洛阳矿山机器厂。同年6月，31岁的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，怀着满腔激情，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想来到正在筹建中的洛矿。一办完报到手续，他就急切地对负责人事工作的同志表示，自己的身子骨很结实，经得起摔打，请赶快分配活儿。

工厂建立在离老城几十里路的涧西，当时，收集资料、修路架桥、营造厂房等建设任务十分繁重，大家立志要在“一张白纸”上画出“最美的图画”，有些刚从农业战线转到工业战线的同志，一时不适应，产生了畏难情绪，焦裕禄便编了段“顺口溜”鼓励大家：“大老粗，不要怕，干工作，学文化，蚂蚁能啃大骨头，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！”

厂里提出，当务之急是要修一条从车站到厂区的公路。焦裕禄主动承担了这个紧急任务，厂里只给了他半年时间，领到任务后，焦裕禄就和工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在筑路工地上。由于临时搭建的工棚小，焦裕禄白天忙着在工地跑来跑去，晚上将工棚留给工人住，他提出干部在露天睡觉，自己带头把铺盖搬到野外，并风趣地表示，天作房地作床，这么大的屋子，这么大的床，往哪找啊！

1954年夏天，涧河水猛涨，当汹涌奔流的洪水危及工人们在涧河上临时搭建的木桥时，焦裕禄第一个跳入湍急的洪水中，经过奋战，终于保住了木桥，而焦裕禄的双腿受伤，鲜血直流，但他却顾不上自己，还忙着给工人们送饭。大家的干劲都很大，最终仅用三个多月时间，就完成了任务。看着一辆辆装满材料的汽车飞驰而过，大家都很开心，而焦裕禄又期待着新的任务。

刻苦学习

1954年8月，为了培养技术骨干，洛矿选派了焦裕禄等5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。正当他们经过努力，终于通过考试，准备迎接大学本科班学习的时候，洛矿提前投产，急需管理干部，组织决定，让他们终止

学习，转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。

1955年3月，焦裕禄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后，被分配到二金工车间担任实习副主任。一到大连，他就迫不及待地问起重机器厂的老同志，学会工厂中的管理业务需要多长时间。在得到一两年时间才能入门的答复后，焦裕禄知道自己等不起，洛矿也等不起。他开始争分夺秒地边工作边学习。上班时间，他向工人学专业技术，向计划员学计划安排；下班时间，他就下苦功研读《工厂管理基础知识》等书籍。经过半年时间的刻苦学习，焦裕禄不仅掌握了别人需要一两年才能掌握的知识，还能够精准编制车间生产计划，大家都夸赞他是“最棒的车间主任”。

繁忙的工作之余，焦裕禄还勤于思考、笔耕不辍，不仅连续在厂报发表了《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》等文章，还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“十条工作经验”：一要依靠群众；二要发扬民主；三要经常总结工作；四要学习政治；五要利用积极分子做工作；六要了解群众思想，关心群众生活；七要依靠党的领导；八要搞好团结；九要学习党的政策；十要主动向上级汇报工作。

实习即将结束时，大连起重机器厂提出想把焦裕禄留下来，他没有接受，因为洛矿更需要他。



礼，《说文》解释为盛豆的器皿，王国维则认为是盛玉的器皿。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“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。”礼，起源于吃食的文明化，简而言之，最初是指给祖先上供吃食的仪式，又发展为吃饭的仪式和规矩，后来，就把所有各种尊敬他人的仪式，一概称为礼。

我们中国人是把他人当作客人来尊重，待人接物，“如临大宾”，这种对待他人的态度，就是“礼”。在古代，“是故夫礼，必本于天，殽于地，列于鬼神，达于丧、祭、射、御、冠、昏、朝、聘，故圣人以礼示之，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。”礼的内容，似乎无所不包。时至今日，礼就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，为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。

我们共产党人讲“为人民服务”。毛泽东主张靠调查研究吃饭，刘少奇讲“扎根串连”，邓小平讲“包产到户”，作家柳青能从房东大娘的哭与笑来判断上面的政策好还是不好，这就说明：马克思主义只有走进中国千家万户，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。到老百姓家里走亲戚串门，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，而礼就植根于中国的家与户——走家串户，我们把这种本领叫走“群众路线”。

北京第一任市委书记彭真说，共产党

中国共产党的「礼」

□ 韩毓海

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——老百姓进了咱们的办公室，先给人家倒上水，叫一声大爷、大娘，大叔、大婶。彭真讲的这个，就是“中国特色”，与老百姓打交道，要如履薄冰，如临大宾，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的一般态度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礼。

（摘自2021年第2期《中国青年》，原标题为《经学的现代意义》）

毛相林：脱贫路上的当代“愚公”

□ 陈国洲

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下庄村被称作“天坑村”。曾经，四面绝壁犹如一围难以跨越的高墙，将下庄人紧紧围在里面。近400名下庄村民中，近一半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。

1997年，毛相林当选村党支部书记，他提出要修一条出山路。“咱不能一直当穷汉！”在村民大会上他给大家鼓劲：“山凿一尺宽一尺，路修一丈长一丈。这辈人修不出路来，下辈人接着修，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！”会上，毛相林带头签下了一份“生死状”，誓言“路不通，不罢休”。修路远比想象的难。四周岩壁陡峭，很难找到落脚之地，胆子大的腰系长绳站在箩筐里，吊在几百米高的悬崖边钻地眼，先炸出一小块立足之地，再用锄头、钢钎和大锤，一块一块把石头凿下来。

“下面就是万丈悬崖，并且上面还在落石渣。毛书记第一个往前冲，把险排好，腰上系着一根绳子，老百姓就跟着他下去了。”当年参与修路的村民杨元鼎说。这一修，就是7年，期间有6位村民先后为修路献出生命。在安葬村民黄会元的葬礼上，毛相林声音颤抖着问大家：“如果再修下去，可能还要死人。今天大家表个态，这路到底修还是不修？”“修！”有人大声吼道。回应的人，正是黄会元的父亲黄益坤。在场所有人举起了手。

2004年，一条8公里长、2米宽的机耕道，终于在绝壁上修通了！“路通车的那天，毛书记找来一辆车，把路从头到尾地走

了一遍。我们全村人都跟着车子后面走了一遍。”村民彭仁松说，走到终点的时候，毛相林哭了，全村人都哭了。

后来，当地政府先后对下庄村的道路进行加宽、硬化加固，并加装护栏。从下庄村到县城的时间，由过去的两天缩短到一个半小时左右。

2004年公路通车时，下庄村还戴着“贫困帽”，大多数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。毛相林明白，要想脱贫致富，光靠路还不够，得搞出像样的产业来。

他请来农业专家对下庄村的土壤、气候、光照等进行全面考察评估，最后确定发展柑橘、桃、西瓜三大脱贫产业。县里也派来了果树栽培技术专家，手把手培训村民。

经过几年的悉心培育，全村650余亩柑橘产业初见成效。2015年，下庄村整村脱贫；2020年，全村人均收入超过1.3万元。2021年2月25日，毛相林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。他被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荣誉称号。“这份荣誉让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今后更要加努力回馈乡亲们。”毛相林说。

回到村里，他和村民们一起谋划好了乡村振兴的新产业：改善村里人居环境，完善旅游接待基础设施，发展乡村旅游。像当年一样，下庄村又召开了村民大会。村民们在这个老党员的带领下，又一次许下了誓言：“不致富，不罢休！”

（摘自2021年6月23日《经济日报》）

焦裕禄在洛矿

□ 贾关青 蔡相龙

去休息一会儿，焦裕禄都拒绝了。

就这样，在焦裕禄的领导下，一金工车间克服了设备不全、原材料和零部件奇缺等重重困难，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，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，不仅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，还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。

这台卷扬机仅重量就达108吨，同年8月，分配给河南义马观音堂煤矿后，使该矿的提升能力较过去翻了一倍。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，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，表现出良好的安全和使用性能。

1959年1月，焦裕禄由于出色的表现，被厂党委任命为生产调度科科长，5月又当选为厂党委委员。1962年，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，重新回到农业战线任职，从此告别了9年的工业岁月，开始了他人生又一段新的征程。

（摘自2021年6月11日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

